

第十七任

1925-1930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金文泰（1875-1947），又譯作克萊門蒂，英國人。1875年9月1日生於印度北方邦坎普爾，被送回英國接受教育。先就讀於倫敦的聖保羅公學，後來升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1899年被招募為官學生來港，在廣州學習粵語和中國書法兩年。曾在新界土地測量處工作，1907年任香港助理輔政司，1909年代表港英政府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國際禁煙會議。次年任梅合理的私人秘書。1913年任圭亞那輔政司，1922年轉任錫蘭輔政司。英廷認為金文泰熟知中國文化，對中國的態度一向友善，於是委任他接替司徒拔為港督，以設法緩和省港局勢。金文泰是首位從皇后碼頭登岸履新的港督，從該處登岸履新成為了此後歷任港督的傳統。在新加坡供職期間，金文泰患上糖尿病，提前於1934年2月16日退休。1947年4月5日因心臟衰竭病逝於白金漢郡，終年71歲。

1925年10月，司徒拔被倫敦調回。11月1日金文泰抵港，就任第十七任港督。1930年2月金文泰任滿離港，任期共五年。

1930年金文泰離港後，赴新加坡任總督兼馬來亞高級行政專員並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譯著有《嶺南情歌》、《英屬圭亞那的華人》等。

香港有的報刊認為，從金文泰以後的三位港督當政時期，是香港休養生息的時期，他們都為香港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

英國史學家弗蘭克·韋爾什認為，金文泰是殖民地部門的一個怪人，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牛津大學，文官考試成績也異常出色，完全有條件挑選政府的任何部門去工作，例如印度事務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他選擇了被視為才智平庸之輩的避難所的東方殖民地司。1899年金文泰來到香港，從事新界土地登記工作。

金文泰受到各方面的好評，尤其是他的上司十分欣賞他，稱讚他的才幹。卜力認為他是「東方司最具才幹者之一，一個學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將有所成就」。盧押稱，金文泰才華橫溢，富有同情心，令人愉快。他來港前的署理港督施勳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金文泰被任命為總督，不失為明智之舉，他會幹得很出色。金文泰很快理順了司徒拔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各種關係，不但與廣東政府，還與英國外交部及其駐北京、廣州的代表建立了聯繫。

着手解決罷工問題

1925年11月12日，金文泰上任伊始，他以兼任校長的身份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他表示，廣州和香港向來就親睦如一家人，這一次工潮，雙方都受到損失，深願廣州當局向香港伸出友誼之手，我們願意立即牢牢把握住。

司徒拔給金文泰留下的是一座「死港」。金文泰就任港督後，首先要處理的是前任留給他的大罷工和新界兩個問題。他和司徒拔的強硬態度不同，採取了較平和的策略。他親赴大埔作新界鄉紳的工作，通過他們勸說村民把蔬菜、雞鴨等副食品運送港島，解決因罷工而產生的市民生活供應困難。為了爭取新界人士，金文泰宣佈撤銷司徒拔頒佈的新界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提議將「新界農工商研究總會」改名為新界鄉議局，並認可鄉議局是港英政府在新界施行新政策的一

個諮詢機構。

在解決罷工的問題上，金文泰前後態度變化很大，開始他汲取了司徒拔的教訓，上任伊始，便一改以往港英政府敵對與強硬的態度。他向英國政府提出，由香港政府直接出面與廣州方面交涉聯絡。他主動多次表示願意和廣州政府通過談判來解決罷工。廣州方面也採取了積極態度，準備與港英當局派出的代表進行談判。

1925年12月15日，金文泰提出廣州方面委派重要職員來港，交換意見。廣州政府派財政部長宋子文赴港，與港督金文泰及其他港府要員舉行了會談。會談中，宋子文提出，罷工欲求解決，港英政府必須在經濟上滿足兩個先決條件，即賠償罷工工人在罷工期間的損失與重新安排罷工工人的工作。港英政府則聲言，重新安置罷工工人已不可能，因為罷工工人先前的工作早已被人代替。宋子文表示，可以用賠償的方式予以解決。關於賠償問題，金文泰指出，港府認為這種賠償要求無異於敲詐。但是，由於對港封鎖曠日持久，香港的多數華商及一些英商寧願償付這筆費用，也不願讓這種狀態持續下去，而港府對於這類舉動不好加以阻攔。因此，賠償問題雙方還可以進一步商談。

雙方在廣州又舉行了多次會談。港方表示，應將罷工工人所提政治、經濟條件分開談判。關於經濟條件，港方可與罷工工人磋商。關於政治條件，港府願以廣州政府為談判對手。廣州政府表示，如果香港當局原則上能同意經濟條件，政治條件可另尋一方式磋商。

港方代表返港後，金文泰改變了主意，認為這樣的解決方式對香港將會產生不利的影響。他立即宣佈，港府不能參加此類解決方式的談判，但不妨礙華商自己籌集資金來解決罷工問題。港英當局如此缺乏誠意，就注定了談判已無法進行下去。12月30日，香港華商代表抵穗商談經濟賠償條件問題，廣州方面拒絕與之談判。

金文泰對談判的失敗並不感到遺憾。他本人一直懷疑，向廣州支付這筆「勒索款」是否能確保香港的永久安寧。1926年1月4日，金文泰召開行政局會議決定，「香港目前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維持現狀，直到廣州現政府被中國某一敵對將領所推翻」。

金文泰從最初主動提出願意通過談判來解決罷工，到後來態度變得越來越強硬，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覺察到了廣州政府即將發生變化，國民黨右派勢力逐步擴

張。1月13日，金文泰召集港府要員舉行會議，進行了專門研究，與會者一致認為，廣州的右翼人士即將得勢，廣州政府不久即將分裂，罷工委員會就要被解散，對香港的封鎖也將隨之結束。1月25日，港英當局悍然對外宣佈，中止有關解決罷工的談判。

6月5日，廣州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致函金文泰表示：本政府現已準備與香港政府磋商罷工事件，並準備委派全權代表三人，深信香港亦宜委派負有同等權責之代表三人，進行磋商。6月16日，金文泰通過英國駐廣州總領事覆函廣州國民政府：香港罷工已成為過去之事件，但他已任命代表，願就排斥英貨問題與廣州政府談判。

廣州國民政府為了表明解決罷工的誠意，主動作出讓步。6月21日，陳友仁覆函英駐廣州領事，一方面聲明「罷工仍為政治上的一件要事」，同時也表示可以「磋商廣東人民業已維持一年之久杯葛運動解決之方法與手段」。

7月15日，中英談判終於在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舉行。談判從7月15日起至7月23日結束，前後共舉行了5次會議。在第二次會議上，中方代表團發表了《關於對英杯葛之意見書》，分析了此次省港罷工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由於繼上海「五卅慘案」後，英國在廣州製造了「沙基慘案」，從而激起了廣東人民的極大憤慨與反抗情緒。《意見書》對港英當局與中國人民為敵，對廣東採取經濟封鎖的行徑進行了斥責，並對港英當局無理拒絕廣州政府在「沙基慘案」發生後所提出的解決條件提出了質問。由於英方對談判無任何誠意，5次會談均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9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為全力支持北伐戰爭，決議主動取消封鎖港澳政策，恢復粵港交通，准人民自由往來。為解決罷工工人所需費用，決定對進口貨物加徵二五附加稅，用來賠償罷工工人損失，由政府和罷工委員會派員在海關徵收。罷工工人每人領取相當於十個月工資的100元。工人可以回港工作，也可以在內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罷工委員會繼續供給生活費。10月10日，正式宣佈主動停止封鎖香港，結束這次罷工鬥爭。至此，歷時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勝利結束。這次省港罷工使英帝國主義遭受沉重打擊，進出口船舶和稅收減少，估計貿易一項損失達幾億英鎊。

張月愛在《香港1841-1980》一文中論及省港大罷工時認為：「香港傳統的華



人社會，已起了深刻的變化，華人社會開埠以來首次對英國人的統治，表示懷疑，隨着社會發展而出現的香港工人階級，也首次顯出他們的力量。」「香港政府也首次真真正正面對如何統治這一個華人社會的問題，統治的態度也相繼改變。」

收復和反收復租借地的較量

1921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對戰後遠東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進行再分割，召開了華盛頓會議。會議期間，中國代表顧維鈞提出要求取消和早日停止使用所有的租借地。顧維鈞在議案中「歷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衝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由於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壓力和列強之間的相互矛盾，以及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使列強不得不有所退讓。法國聲稱同意撤出廣州灣；英國後來聲稱在集體交還租借地時會放棄威海衛；日本也被迫表示同意交還膠州灣。但是，英國代表、樞密院大臣貝爾福在會上力圖避開新界的問題。他說，新界應該繼續由香港管理，「因為沒有它，香港就完全無法防守」。

在12月7日的第13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反駁了貝爾福的言論。中國代表指出，保留新界並不是保衛香港的唯一解決辦法。由於英國得到其他帝國主義強國的支持，中英雙方僅就新界問題進行過一次小小的交鋒，就不了了之。

1924年1月，共產國際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確提出：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在這以後的幾年內，中國國內的反帝愛國浪潮不斷高漲。1927年1月，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下，湖北的工人、學生和其他愛國群眾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面對這些疾風暴雨般的反帝愛國運動，英國當局坐立不安。香港總督金文泰竭力鼓吹合併新界，長久佔據。1926年1月，他在一封機密信件中建議保住新界。一年之後，他在一份電報中說，鑒於中國各地都有人在煽動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該租界地（指新界）永久化。萬一英

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海衛的補償，或者作為「慷慨地」修改條約的補償，或者以之作為重歸舊好的條件。

但是，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認為，金文泰的建議只會更加激發中國人的反帝愛國情緒，加劇帝國主義對英國的指責，因此，藍浦生竭力反對金文泰的建議。於是，英國外交部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但是，稍晚些時候，金文泰被授權發表了這樣的聲明：「當內戰的戰火不幸在中國燃燒之際，英皇陛下政府全力保護香港及其大陸部分，他們絕對不會交出香港，不會以任何方式在英國統治的大陸的任何部分放棄或削弱其權利或權力，英皇陛下政府保有它們符合它的最高利益。」



正視港人的力量

香港民眾的抗英鬥爭，使英國和港英政府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受到了嚴重損失。據巴圖所著《別了，港督》一書記載，英國官方估計，1925年英國在中國市場的貿易份額比1924年減少了21%，同期香港對內地的貿易額減少近23%。英國和港府對華貿易商品價值共損失32%。

香港罷工結束以後，金文泰致力於改善港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他懂得在香港如果排斥佔人口總數98%以上的華人，香港的政局將是不可能穩定的，香港的經濟更談不上繁榮。他設法多讓香港華人參與香港事務。他突破歷來行政局不許華人參與的傳統，首次委任華人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金文泰的這一做法，受到殖民地大臣艾默里和外交大臣張伯倫的反對，他們認為華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任。金文泰一再請求，英國政府才同意這一任命。

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第一位華人是周壽臣。周壽臣於1861年出生，早年在中國海關和鐵路工作，以後在香港定居，1923年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26年被委任為行政局三個非官守議員之一。

金文泰的這一行動，在香港歷史上具有一定意義。在此之前，華人長期被拒諸行政局門外。

金文泰致力於擴大立法局組織。1929年，他將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由6人增加到8人，其中華人議員由2人增至3人，新增加的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是曹善

允，屬九龍區居民，他也是九龍首位立法局議員。

1927年，金文泰正式命令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聘請賴際熙、區大典二人為講師。對於港大中文系開設的經費，金文泰還撥款予以資助。

因此，香港人民逐漸恢復了信心，使這個已經癱瘓了的轉口港，逐漸恢復了正常運作。為了盡快收拾司徒拔留下來的爛攤子，金文泰請求英國政府撥款支持香港。1927年5月，倫敦政府決定貸款300萬英鎊，協助香港重新發展貿易。到了1927年底，香港進出口船隻近3萬艘，總噸位達到約3,500萬噸，已經接近省港大罷工前1924年的水平。

隨着轉口貿易的恢復，香港的經濟又重新開始發展，香港政府的收入也逐漸增加。1930年，港府收入有3,000萬元，達到歷史上最高水平。當年港島最高建築物，是高達九層的告羅士打大廈。同時開始建築城門水塘、啟德機場、廣播電台以及耗資300萬港元的九龍半島酒店。香港又恢復了轉口港地位的活力。

金文泰盡量為在港華人做些實事，緩和與華人以及內地的關係。1928年3月10日，金文泰訪問廣東。3月11日，廣東省政府招待到廣州訪問的金文泰，金文泰在演說中表示，對於粵港重新合作感到歡欣，希望粵漢鐵路同廣九鐵路早日接軌。

同年，前皇家空軍飛行員成立飛行俱樂部。港督金文泰給予大力支持，提請立法局通過撥款6萬元，並決定以後每年撥款作為俱樂部經費。同時，決定由政府接辦飛機場，因為地皮是由立法局議員華人何啟、區德投資開發，機場完成之後，就以他兩人的名字命名為啟德機場。

同年，教育當局的中國課程委員會訂定《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其內容與中國內地相同。當時，全港中文學校的學生約有4.5萬人，英文學校的學生約有1.7萬人。

同年，港英政府開展房屋計劃，將市區內的貧民窟拆毀後重建，積極改進公共衛生設施。

1930年1月4日，中國確定將海關稅改為金本位，中英開展海關協定的談判，又有人向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建議，以海關協定為杠杆，要中國同意英國保有新界延至1997年之後。當時正是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革命運動發展時期，所以藍浦生認為時機不成熟，「毫無討價還價機會」。

省港大罷工結束以後，由於港督金文泰看到了香港華人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促使香港英國人士與華人之間的交往和友誼進一步發展。金文泰的策略是英國全局政策的一部分，他只有首先穩住香港內部，才能保住香港。這對後來幾任港督也有一定的影響。

水荒和制水

香港最大的水荒有兩次，一次是1895年，一次是1929年。香港天文台由1884年開始記錄香港雨量，根據記錄，1895年降水量為45.83吋。當年全港人口約為24.8萬，因為當年大旱，雨量突然減少，香港開始實行首次制水，不過只在晚間實行，未造成嚴重水荒。為了解決香港居民的用水問題，港府加緊城門水塘的工程建設。

1929年，香港全年降雨量只有69.82吋，而人口接近80萬，造成了歷史上的嚴重水荒。據記載，當年4月，香港大旱，開始實行七級制水，6月，大旱持續，六個水塘中有五個乾涸見底。當局成立了食水供應委員會以應付水荒，又宣佈緊急措施：樓宇水喉全部停止供水，居民須在食水供應站領水使用。全港80萬名居民只靠街上306個水龍頭，每天供水兩小時。7月初到8月底，港九處在極度水荒中，全港各團體紛紛集會，請求當局改善水塘設備及供應。當局採取應急措施，將廣九火車的車廂全都改成水箱，到深圳河汲水運來供應，同時派船隊到珠江汲取淡水，運來供應居民。

當年有些投機分子，用水艇到寶安縣運水來港發售，每桶2毫，發民難財。為了逃避水荒，據統計約有20萬人離開了香港。

直到9月5日，水荒威脅才漸告解除。事後，金文泰力促趕快興建海底輸水管。1930年2月底，海底輸水管建成，舉行引水禮。



居民為總督祝壽

新界人一直對港英政府沒有好感，這是因為英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取得新界的租借權；在佔領新界的過程中，又曾對新界鄉民動用過武力鎮壓；在接管新界後，又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推出了集體土地契約，將全新界的私人土地收歸為「皇土」，按年納糧。直到金文泰接任第十七任香港總督，在這位「中國通」的努力下，香港政府與新界人的關係才獲得改善。金文泰是在省港大罷工的大氣候下接任港督之職，當時香港經濟已成一潭死水，恢復香港經濟是他首要的任務。而這位港督採取了懷柔手段，不獨對新界鄉民，甚至對港九的華人，都一反其以前歷屆或多或少所採取的對抗態度，盡可能籠絡人心。

當時全新界的鄉紳都反對港府的民田建屋補價政策，他們組成了「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與港府長期周旋，但屢次上呈意見，都不為第十六任港督接納。

金文泰一上任就贏得新界人的好感，一方面是由於他就任總督前，已經在香港工作生活了十四年，熟悉中國文化，懂得中國的風土人情；另一方面，與他曾在香港工作過也不無關係。

金文泰在 1899 年考選為香港官學生，曾隨宋學鵬研習中文，將招子庸的《粵謳》譯為英文。他是 1843 年砵甸乍就任香港總督以來首位通曉中文及能譯粵語的總督。1927 年，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是他大力贊助的結果。後來港府將官立中文中學，改名為金文泰中學，就是用來紀念這位重視中國文化的港督。

1903 年，金文泰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有機會深入民間，熟識新界情況，在新界民眾中有許多老關係。因而他日後能體恤新界民情。

1925 年 12 月，金文泰接任港督後一個月，便訪問新界，當時新界鄉民所非議的民田建屋補價問題仍未獲解決，但一班鄉紳對於這位新任港督寄予厚望，以「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的名義，在大埔墟蓋搭葵棚為歡迎禮堂。在禮堂前的橫額，用花朵砌成「還我使君」四個大字，歡迎金文泰。所謂「使君」，是中國古代對奉使之官的尊稱，金文泰之職相當於中國古時州郡的長官，並且曾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過，所以稱為「使君」。金文泰抱着與華人改善關係的態度訪問新界，新界鄉紳亦抱着新任港督會收回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的期望作盛大歡迎。

1926 年，「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呈函金文泰，就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重申反對意見，金文泰總督終於命令理民府取消此項政策。新界鄉紳自然視此為德政，就在當年 9 月 1 日金文泰 51 歲誕辰時，為金文泰祝壽。祝壽會在大埔墟舉行，由新界鄉議局蓋搭一座葵棚為禮堂，除舉行壽宴外，並呈送《金文泰制軍五一賀壽序文》。序文曾在《中立報》連載。

香港歷任總督中，能夠獲得民間團體為他祝壽，而且民眾對其家庭成員也相當友善的，相信只有金文泰一人，這也反映出他成功收買了新界的人心。金文泰本身亦喜愛新界，在工餘經常爬山涉水。屯門青山峰上韓陵片石亭之北豎有一石碑，記述了金文泰二遊青山的事蹟。

在港島，還有一條用金文泰夫人命名的山徑，即「金夫人徑」。這條小道位於金馬倫山道與香港仔水塘道之間，是港島山徑中比較有名的一段。沿途有幽靜的山林小徑、古老的石橋、高崖相接的石澗流泉，還有平靜清澈的水塘和近百年歷史的高壩。從皇后大道東上灣仔峽道，約四十分鐘的路程來到灣仔峽公園，在公園南面金馬倫山道往前行不久，向右拐入香港仔水塘道，走數分鐘後迎面便可看見寫着「金夫人徑」的路牌。這條為紀念金文泰夫人而命名的山間小路，寬只有一米多，前段狹窄幽深，過石橋後變得寬闊。走完此徑需四十分鐘，接着走灣仔峽道一段，全程需一個小時。

香港島的金文泰道、金督馳馬徑、金文泰中學，都是為紀念他而命名的。

1930 年，金文泰與夫人佩尼洛普一道離開香港，兩人都很悲傷。他說：「對於我們兩人來說，離開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我寧願快樂的留在這裡，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

